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

主编 陈来

洪 谦 选集

HONGQIANXUANJI

韩林合 / 编



中国哲学的阐释
西方哲学的透视
哲学体系的创建
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之作
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标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洪谦选集

韩林合 / 编

HONGQIAN
XUANJI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洪谦选集/陈来主编. 洪谦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5

ISBN 7-206-04680-0

I. 北… II. ①陈… ②洪… III. 洪谦(1909~1992)—哲学思想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64 号

洪谦选集

著 者: 洪 谦

编 者: 韩林合

策划编辑: 徐家康

责任编辑: 崔 凯

封面设计: 沈 赫

责任校对: 校 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431-5395846

印 刷: 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70mm 1/16

印 张: 36.75 字 数: 60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68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 1919 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 1914 年正式招生，至 2004 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君毅、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自豪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 20 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 90 年的发展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 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 年以后，北大哲学系不断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

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或新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的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式，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宽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 1949 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

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 20 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 50 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绍介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 20 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2004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90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来

2004年12月20日

前　　言

一、生平和著作

洪谦（外文名 Tscha Hung），又名洪潜，号瘦石。祖籍为安徽歙县，1909 年生于福建。在东南大学读预科法学时，他在《学衡》上发表一篇讨论王阳明的文章。康有为看到后，觉得他很有哲学才华，于是约他到上海天游书院见面，并推荐他跟梁启超学习。后来，梁启超又介绍他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跟随阳明权威宇野哲人学习。但是，因生病，他只在日本呆了半年便回国。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预科旁听了一年，受到梁启超和梁廷灿的细心指导。

1927 年，梁启超推荐洪谦到德国耶拿大学跟随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倭铿（Rudolf C. Eucken, 1846 – 1928 年）学习精神哲学。到了德国后，他才知道，倭铿已于前一年过世。不过，他还是决定留在耶拿大学学习。在那里，他选听了物理、数学、哲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维恩（W. Wien, 1864 – 1928 年）的物理课、新康德主义者鲍赫（B. Bauch, 1877 – 1942 年）和现象学家林克（P. F. Linke, 1876 – 1953 年）的哲学课。在此期间，他涉猎群书。莱欣巴哈（H. Reichenbach, 1891 – 1953 年）有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著作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于是洪谦转学到柏林大学，以便能够聆听他的课程。由于他的兴趣主要在哲学上，莱欣巴哈建议他到维也纳随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 – 1936 年）学习。1928 年，洪谦来到维也纳，成为石里克的学生。石里克建议他首先将数学、逻辑和物理学学好。于是，他先后听了汉恩（H. Hahn, 1879 – 1934 年）的数学课、埃伦哈夫特（F. Ehrenhaft, 1879 – 1952 年）的物理课、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 – 1970 年）的数理逻辑课。哲学方面，他只听了石里克、魏斯曼（F. Waismann, 1896 – 1959 年）、克拉夫特（V. Kraft, 1880 – 1975 年）的课。

从 1930 年开始，洪谦应石里克之邀参加石里克小组即所谓“维也纳学圈”或“维也纳学派”（Wiener Kreis）的周四讨论会。

1934 年，在石里克的指导下，洪谦写出了题为 “Die Frage der

Kausalität in der neuen Physik”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曾经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伯审阅。洪谦在论文中清楚地阐述并强有力地捍卫了石里克的因果观。

毕业后，洪谦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石里克和他的关系十分亲密，他时常到石里克家中欢度节日或会见客人。

1936年6月22日，石里克不幸被一个患神经病的学生枪杀。洪谦遂于1937年初回国。1938年，奥地利自愿合并到德国。维也纳学圈的活动不得不终止，其核心成员先后流亡到英、美等国。

1937年初，回到北京以后，洪谦受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1940年至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授。从1945年到194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任研究员。期间，写成“Moritz Schlick and Modern Empiricism”一文，1949年该文发表于美国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杂志上。1947年他又回到中国。1948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7至1945年、1948至1949年洪谦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武大讲授维也纳学派的学说，重点是介绍石里克的哲学观点。期间，他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1942年第15期）、“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1943年第24期），“维也纳学派与现象学派”（1944年第35期）；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维也纳学派与玄学问题”（1943年第8卷第3期），“或然性的逻辑分析”（1944年第9卷第1期），“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1946年第10卷第1期）；在《科学概论新编》（正中书局1948年版）上发表了“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在《学原》上发表了“康德的先天论和现代科学”（1947年第1卷第6期）。

1944年底，以此前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洪谦编写了《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1945年，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该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修订再版，同时加上了“维也纳学派与现象学派”、“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康德的先天论和现代科学”等三篇文章。）

1951年，洪谦转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直到1965年。此后，他兼任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1955年，洪谦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批

判”一文。1957年3月，他与教研室同仁们联合编写的《哲学史简编》出版。同年5月和6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要害怕唯心主义”和“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康德的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读《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一些理解”；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介绍马赫的哲学思想”。1958年3月，他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评介”一文。

在以后的20年中，现实条件不允许洪谦继续深入地研究他所热爱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因而，他只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译工作之中。在他主持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先后编译出一整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第1版；1961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1961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20世纪60年代初，洪谦还主编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

1973年，哲学系安排洪谦、唐钺、宗白华等共同选译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中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有关的部分。1975年，节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革”以后，洪谦与唐钺、梁志学合作，将全书翻译出来。1986年，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之一出版。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现实条件又允许洪谦继续其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研究了。这时，他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不再像20世纪40年代以前那样，满足于单纯地介绍石里克的思想，而是着力于梳理维也纳学派成员及其相关者之间的观点上的分歧，以及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阐释。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含在如下文章中：“克拉夫特哲学简述”（《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版），“Wittgenstein und Schlick”（载于 *Proceedings of 5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Moritz Schlick und der logische Empirismus”（*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 vol. 16/17, 1982）、“Remarks on Affirmation (Konstatierungen)”（*Synthese*, vol. 64, 1985）、“Logischer Empirismus. Meine Persönliche Perspektive”（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讲演，

中译文载于《哲学译丛》1987年第5期)、“逻辑经验主义概述”(载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7年版)、“Ayer and the Vienna Circle”(载于*The Philosophy of A. J. Ayer, ed. L. E. Hahn, 1992*)、“关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Moritz Schlick: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in their Interconnection*”(Rati- o, 1989, No. 6)、“艾耶尔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鲁道夫·卡尔纳普”(《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4期)。

以上文章，除“Moritz Schlick und der logische Empirismus”、“Ayer and the Vienna Circle”和“鲁道夫·卡尔纳普”以外，均收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之中。1999年，由范岱年和梁存秀编辑的《论逻辑经验主义》一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包含了洪谦1949年后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或其译文)。未收入的三篇文章是：“Moritz Schlick und der logische Empirismus”、“不要害怕唯心主义”、“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批判”。

为了让国人全面、真实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洪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编了《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该书分上下两卷，先后于1982年和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又以合订本形式再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为基础，洪谦主持编译了《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遗憾的是，此书直到其逝世后才出版。

进入80年代以后，洪谦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除了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哲学家外，他还多次出国访问。1980年，他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并访问了维也纳大学和牛津大学王后学院。1982年，他到维也纳参加国际石里克和纽拉特哲学讨论会，并访问了英国牛津大学三一学院。1984年，他又访问了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并到维也纳大学接受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86年，他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88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讨论会，并到香港大学作学术访问。

从1979年起，洪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也曾兼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1980、1982、1984年)和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1981至1992年，他担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87至1992年，任中英暑期哲学

学院名誉院长。

1992年2月27日，洪谦病逝于北京。

洪谦逝世后，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均发表了长篇讣告。^①

二、主要思想

1937年回国后，洪谦便以极大的热情向国人介绍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他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写出的一系列文章对当时还算活跃并颇具创造力的中国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使得当时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不能不重视该学派的思想（特别是其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立场），并依某种方式对其作出回应。比如，当时正处于创造高峰期的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新理学”哲学体系中就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对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出了回应。

维也纳学派断言，传统形而上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们都企图仅凭理性推理就对事实做出积极的——即非空洞的而是有内容的——解释，所以提出了一些不可证实的综合命题，并最终陷入无意义的胡说的境地。冯友兰承认，维也纳学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将它们“取消掉”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他声称，除传统形式的形而上学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这就是他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他又将其称为“真正底形而上学”、“最哲学底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批评所无法“取消”的。那么，冯氏所坚信的这种“真正底形而上学”、“最哲学底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区别何在？对这个问题，冯友兰在其“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按照他的解释，他的“真正底形而上学”、“最哲学底形而上学”旨在对所有事实（即实际）做形式的解释，它采取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通过此种方法所得到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它们对于实际均无所肯定，无所建立。下面是冯氏“新理学”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四组主要命

^① 本部分的写作参考了范岱年、胡文耕和梁存秀的“洪谦和逻辑经验论”（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一文。

题。

第一组主要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简言之，“有物必有则”。

第二组主要命题为：事物都必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以能存在者。简言之，“有理必有气”。

第三组主要命题为：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简言之，“无极而太极”。

第四组主要命题为：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简言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冯氏认为，尽管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对实际都无所肯定，无所建立，但它们却“谈到了”实际，并力图给其以“形式的”解释，所以它们与逻辑命题完全不同，因为后者根本没有说到实际，更不企图给其以任何解释。另外，由于真正的形而上学，一方面以事实之全体为对象，另一方面又只是对事实做“形式的”解释，所以它又完全不同于科学，因为科学只是解释某一类事实，而且它们给出的解释是积极的而非形式的。

冯氏宣称，真正的形而上学是而且必须是一片“空灵”：它对于一切事实做形式的解释，因其解释是形式的、无内容的，所以是“空”的；因其解释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于，所以是“灵”的。这种形而上学虽不能予人以积极的知识，但可使人于实际有一种了解，这种了解是不着边际的。由此种了解，宇宙人生，对于有此种了解的人即有一种意义。此种意义即构成人的一种境界，即所谓“天地境界”。

最后，冯氏断言，由于他的“真正底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对事实做积极的（即有内容的）解释，对事实无所肯定、无所断言，不是综合命题，而是分析命题（形式命题），所以维也纳学派所谓的意义证实标准不适用于它们；但它们又不同于逻辑之类的分析命题，又谈到了实际并力图对其做出（形式的）解释，所以还是具有意义的，因而取消不了。

对冯友兰的这种观点，洪谦进行了坚决的批评。

第一，洪谦指出，冯氏某种程度上误解了维也纳学派关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实际上，维也纳学派并不是想“取消”形而上学，

他们只是想将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活动范围加以指示，在哲学中的真正位置加以确定。

第二，冯氏承认，他所谓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尽管不同于逻辑命题，但它们是逻辑命题的特例，和逻辑命题一样，也是同语反复式。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可能对实际有所解释——所谓形式的解释根本就不是什么解释。

第三，冯氏认为，他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能为宇宙人生提供意义，但洪谦认为不然。我们从诸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是自由的”之类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中可以得到在理想上的许多丰富的感觉，优美的境界，得到许多满足和安慰。但是，如果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命题果真如他所言都是分析命题，是同语反复式，那么我们从其中不仅无有如此的感觉境界、满足和安慰，甚至于似乎有点儿“无动于衷”之感。（不过，在笔者看来，冯氏形而上学命题中的大部分绝不是什么分析命题或同语反复式，而是关于世界的积极的断言。它们中的一些不可证实也不可否证，因此没有意义；另一些虽可证实虽可否证，但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命题。）

前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洪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维也纳学派成员及其相关者之间的观点上的分歧的梳理及对他们的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和阐释之上。比如，在1981年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他令人信服地澄清了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之间的思想承继关系，指出：维也纳学派的许多重要思想——如数学和逻辑命题的分析性质、哲学任务的重新界定等等——实际上在石里克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初步形成，而在那时石里克还不曾接触过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发表于《综合》（*Synthese*）杂志1985年第3期上的“论断定”（*Remarks on Affirmation (Konstatierungen)*）一文中，洪谦对石里克的“断定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石里克之所以提出断定说，是为了给人类的整个知识大厦提供坚实可靠、绝对确实的基础（或真理的终极标准）。在他看来，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所谓的记录命题不能充当这样的基础，因为它们最终说来是可以修正的，而只有他所谓的“断定”才真正有资格充当这样的基础。所谓断定总是具有“现在这里如此这般”的形式，如“现在这里红色”等等。对这种命题的理解也直接包含着对它们究竟是真是假的识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构成其意义的东西都直接呈现在相关主体面前），相反，在所有其它综合命题的

情况下，决定意义和决定真假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断定的这种性质和分析命题相同，因而它们是绝对确实的。但是，另一方面，断定又不同于分析命题，它们又直接涉及到实际。断定的这种双重性说明了它们可以充当我们的知识大厦的基础，充当真理的终极标准。对石里克的这种观点，洪谦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评。首先，石里克混淆了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确实性，断定真正说来与赤裸裸的经验无异，与其说属于逻辑领域，不如说属于心理学领域。一切关于它的“绝对确实性”的说法都只能从心理学方面而不是从逻辑语法方面去理解。其次，石里克的观点混淆了他以前做出的体验和认识的区分。所谓断定根本说来是一种体验，是不可表达的，而认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表达，因而断定无论如何不能充当认识的终极基础。

前文已经指出，洪谦自己所写的作品除“Moritz Schlick und der logische Empirismus”、“不要害怕唯心主义”和“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批判”外，均已经为《维也纳学派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和《论逻辑经验主义》等文集所收录。在本卷中，我们决定收入其所有作品。

洪谦的主要作品均是先用德文或英文写成、发表，然后找人翻译成中文。由于一方面，中文译文容易找到，而原文难寻；另一方面，原文更能让读者了解其学术贡献，所以我们将最重要的几篇外文文章以原文形式收录，同时附上相应译文。另外，我们还收录了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哈勒教授的“洪谦教授访问记”。

本书的编辑工作得到了范岱年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韩林合
北京大学哲学系

编辑启事

从我们角度看，出版业的目的可以简约为一句话：让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一贯的主推严肃学术作品的出版宗旨，而且，在将来的岁月里，更会奉此为圭臬，倾力推介品质优良的学术著作，以促动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人文复兴。

不过，由于我们的学养和视野的局限，常常会犯遗珠于外、奉蔽为珍的错误，以致贻笑大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知识界的援手，也企盼得到真知灼见者的棒喝。如果各位读友有具价值的学术作品的选题，或者建议（当然更欢迎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只是一些闪光的想法，请不要吝惜，提供出来与我们一起共享，（一经我们采用，提出者将获得我们赠送的数量不等的学术图书，书目见附录）一齐推动中国的学术出版事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友的反映，说有些书难以买到。所以，我们开通了学术图书的直销渠道，各位读友可以任意购买附录中开列的图书。购买方法是：通过我们直销通道，请读友将需要的图书书目告诉我们，我们会立即回复告知是否有存余。如果有存余，请购买者将书款汇给我们并告知邮寄地址，我们接到书款后，立即安排邮寄和开具收据发票。凡购买我们图书者，均免除邮寄费用。一次性购买图书金额在40元人民币以上者（含40元），将享受75折优惠，同时免除邮寄费用。

建议通道：

联系人：崔文辉

电话：0431 - 5378029

e - mail: cui1209@sina. com

通信地址：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吉林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
出版公司

邮编：130022

直销通道：

联系人：崔凯

电话：0431 - 5378030

e - mail: cuikai1502@163. com

通信（汇款）地址：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吉林人民出版社学
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130022

吉林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全体同仁 敬启